



吉州永和窑瓷塔



王宁 (江西省博物馆)

永和窑地处江西吉安县永和镇, 古属吉州, 故又称吉州窑。宋代永和窑火鼎盛, 是一座著名的民间窑场, 烧造的瓷器乡土气息浓郁, 装饰手法新颖, 风格清新质朴, 令人陶醉神往, 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于1980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对永和窑遗址发掘过二次, 揭露面积有限, 出土的器物品种不多, 尚不能全面反映永和窑瓷器的面貌。笔者首次介绍过去未曾足够重视的二件瓷塔, 且与以前报道的同类器物综合比较且略加考证, 认为它们属永和窑产品。

一. 绿黄釉四门方塔

该器(封三, 图一、图二)分上下二部烧造, 叠加组合完整成形。现上部下段残缺, 整器通高不矮于100厘米, 残重39.2千克。

它为仿木建筑, 下部平面正方, 顶上平齐, 底有台基, 通高54.3厘米。檐宽49.3厘米。四角圆形倚柱, 四面相同, 每面一间, 柱额间置格子门。门洞居中, 宽阔高大, 外框矩形, 门券多弧连续, 如火焰状。两旁落地高大格子门, 印四直球文花, 上接阑额, 下立台地。阑额横接柱端, 柱承梁架, 梁上坐置斗拱。柱梁上角拱、插拱, 补间铺作华拱, 二跳出檐。拱旁下角置花叶形斜撑, 相对如“八字”, 上架短木, 上安二斗, 与拱共承托檐椽。角脊高起, 檐飞深远, 两端抬升。屋面覆盖琉璃瓦, 瓦脊条沟整齐, 瓦片隔分清楚, 瓦当面印圆圈。四周围有回廊, 重台钩栏, 转角加粗, 柱头低矮, 似如宝珠, 栏板印花, 圈珠密集, 构成菱形。

上部下段残缺, 残高24.0厘米, 顶身角径24.5厘米。身截面正六角形, 屋面六角攒尖, 覆盖

琉璃瓦, 顶托硕大宝珠。

表面色彩丰富, 上下部瓦面和勾栏绿釉, 壁面格子门和门柱墨绿釉, 下部阑额及以上构造和上部屋顶以下面施黄釉。绿釉浑厚莹润, 色泽碧绿鲜艳, 胎釉结合紧密。黄釉薄润欠均, 厚处近褐, 薄处显白。

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和规模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 宫殿、寺塔建筑等级高, 与民用建筑构造的不同体现在建筑的各个方面, “特别尊贵重要的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如重要宇殿及寺观等, 则是使用殿座带周围廊(次要的用前后廊, 再次要的用前廊, 更次要的无廊)。”^①。此瓷质建筑样式采用抬梁式架构、飞檐斗拱、琉璃瓦、六方攒尖顶、周有回廊、双重勾栏和绿黄色彩, 都说明其具有较高的建筑等级。

器物整体平面四方、四向开门、火焰形门券、六方攒尖顶等构造特点, 与塔的形制符合, 故可名为绿黄釉四门方塔。我们细致观察其内底平面时发现, 近一侧门旁, 留有矩阵排列的四点断痕, 推测原处粘接物体(见附图)。

绿黄釉四门方塔胎土淘洗尚欠精细, 质地不算



绿黄釉四门方塔内底断痕

致密,色泽白而泛黄。与我们常见的已知永和窑瓷器胎釉特征相符。此物确切出土地点不清,不过从入藏帐上可知,1956年3月12日由吉安市文化馆移交江西省博物馆,可以肯定它来源于现吉州区或附近地区。

永和窑建筑雕塑瓷器未曾引起人们注意,与其存世稀少和科学发掘不见标本有关。只是1982年吉安县文物管理办公室收藏了一件当地出土的名之“素胎六方亭阁式雕塑建筑”(封三,图三、图四)^②,残高29、檐宽45、底径9厘米。因其残缺较多,介绍简略,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件亭阁式雕塑建筑尽管有残缺,但主要形制依然可辨。器物平面六方,仿木建筑。下有台基,屋身角柱间有的被墙壁封闭,有的安装格子门。门上透雕如《营造法式》上所载“四斜球文格眼”。柱上架梁,梁置斗拱,补间铺作,斗拱出跳,屋檐飞出,角脊高翘,屋面铺盖琉璃瓦。周围回廊,重台钩栏,寻杖三跨。中有立柱,上下出卯,下卯立在地袱上,穿透中间横木,将寻杖和地袱连为一体。柱头低矮,瓜样造形,二层华板,减地雕刻出阳起的如意头纹。器物结构复杂,制成规整。器表素胎,只有屋顶一角可见斑点绿釉。

宋代永和窑瓷器的绿釉仍以铜为着色剂,先高温烧成素胎,然后二次烧成低温绿釉。绿釉瓷是其主要品种之一。常见的永和窑绿釉器是印刻花纹枕,窑址曾出土此类器物素胎残片。因此素胎六方亭阁式雕塑建筑是一件没有完工的半成品。

“六方亭阁式雕塑建筑”屋面半截平齐,从绿黄釉四门方塔的形制看,其上部盖顶缺失。它那抬梁式的构造,复杂的斗拱,飞出的屋檐,高贵的琉璃瓦,精雕球文的格子门,还有高规格的重台钩栏等特征无不说明建筑等级的高贵。

绿黄釉四门方塔和“素胎六方雕塑建筑”二者有许多共同点,均为仿木建筑,台基、回廊、重台钩栏、球文格子门(窗)、琉璃瓦,且上下分段烧制,层叠组合完整。后者虽为素胎,也沾附绿釉,它们的绿釉色泽、质感相同,胎质相近。因此它们的产地、时代、功用相同。后者墙壁封闭,并非全面敞开或全为门窗,因而不是亭,亦是塔,故可名为素胎六方塔。此件形制类同的六方塔印证了绿黄釉四门方塔也属永和窑的产品。

唐代没有木塔遗存,砖石塔多为仿木建筑,普遍采用方形平面,不少是单层的方塔。宋代塔的平面普遍采用六边、八边或十二边形,方形反而少用。如山西平顺县海会院内明惠大师塔是唐乾符四年(877

年)建的一座单层方形石塔^③,顶有二段,截面八边形。绿黄釉四门方塔的主体风格与明惠大师塔相近,具有唐代风韵。素胎六方塔则有典型的宋代构形。

唐代塔身多用方柱或八方柱支承,宋代多用圆柱。绿黄釉四门方塔倚柱圆形,柱承梁架,二跳拱承托出檐。翼角的做法具有南方地区特点,结构合理,实用简洁,角拱和插斗配合,这在福建闽侯雪峰崇圣寺上可以见到,两者做法相同^④。补间铺作二跳华拱,拱边下内角置花叶形的叉手,如“八”字斜撑一短木,上又加二斗,亦承檐椽。此种铺作较为特殊,“八”字斜撑与六朝起始、唐代中叶便退出的檐下斗拱补间的人字拱^⑤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也具有稳定构架的功能。

唐代立面较为宽阔,间的高宽比例接近,宋代高度增加,横宽缩窄。唐代单层的四方塔常用单弧的火焰券门,如山西五台县佛光寺祖师塔,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⑥。永和窑绿黄釉四门方塔面间高宽接近,多弧火焰门券,承接了前代风格。

四门方塔和素胎六方塔门窗精致,两侧落地球纹格子门(窗),上顶阑额,下立台地。素胎六方塔则镂雕四斜球文格子门。唐代盛行直框窗,咸通七年(866年)所建山西运城县招福寺禅和尚塔就有如球纹(或称龟锦纹)的窗棂。五代末年的虎丘塔,又发展为花纹繁密的球纹^⑦。宋代门窗流行四直、斜球文格眼纹,具有时代特点。宋代落地格子门窗“自顶至地全部为方格眼,无腰华版、障水版,用在台基边缘。其做法是先在台基边缘立小柱,上端抵在出跳拱或椽下,在柱间偏上处加横枋,下端加地袱,其间装这种满布格眼的格子门。……它应是始于南宋初,至中期光宗、宁宗时大为盛行的”^⑧。这里将落地格子门窗盛行时间定为南宋。唐代塔有简单台基,不筑基座。宋塔开始设基座,有四周回廊,如泉州开元寺仁寿塔。绿黄釉四门方塔和素胎六方塔四周带有围廊,均为重台钩栏,柱头低矮,花板雕刻精美,前者印花圈珠,在永和窑绿釉枕上常可见到。这些体现出明显的宋代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色彩也有较为严格的等级规范。“宋金宫殿逐步使用白石台基,红色的墙,柱、门、窗及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而在檐下用金、青、绿等色的彩画”^⑨。有专家认为“宫殿寺宇屋顶满覆琉璃瓦的做法约始于北宋中期或稍前,殿阁屋顶用黄、蓝、绿色琉璃,脊及檐口用不同色琉璃,近于北宋至金的特点,上限最早不超过北宋中期。”^⑩绿黄釉四门方塔色彩丰富,绿色、墨绿和黄色并用,具有着宋代及以后

才有的特点。

吉州永和窑绿釉枕的烧造确切时间可早到北宋后期。安徽黄山宣和三年沈格夫妇合葬墓出土了二件永和窑绿釉长方委角枕^⑪,1981年12月永和窑遗址出土了一块印款“元祖郭家/大枕记号”枕底残片,约为北宋末至南宋初时之物^⑫。陈伯泉先生曾认为永和窑的绿釉瓷主要是北宋时期烧造。因而永和窑绿釉器的烧造时期应在宋代。

综上所述,从二件瓷塔的建筑结构和瓷器的制作工艺来看,我们认为绿黄釉四门方塔和素胎六方塔是宋代永和窑的产品,或进一步说,大致在北宋的后期至南宋的早期。

二. 褐彩卷草纹六方塔

褐彩卷草纹六方塔(封三,图五),仿木建筑,平面六方形,上下二段组合成形,现上段缺失。残高34.5、屋面角径42.3、底角径31.0厘米,重12.8千克。底面平无台基,房屋六角造型,顶面开口平齐,柱圆粗大直立,柱间平板封实,曲檐六角耸起,屋面刻划板瓦。褐色彩绘装饰,板瓦均匀涂抹,柱梁地袱涂画。壁墙四周描框,五面内画卷草(封三,图六),卷草刻划细线。一面描画大门,门画泡钉四行,每行大约七枚。

褐色彩绘是吉州永和窑瓷器独特的装饰手法,画案形式多样,或写意绘画,或变形图案。卷草纹是南宋时期永和窑常用的纹样,线条流动飘逸,纹样生动活泼。长线条的卷草延续不断,形成螺旋蔓延,短线条的作S形卷曲,自成相对独立单元。它们还附加点缀装饰,精致者加刻细线,褐彩中露出胎质本色。褐彩卷草纹六方塔墙壁上卷草纹属于短线类,再刻划细线。其来源与绿黄釉四门方塔相同,也应是出自吉州。褐彩卷草纹六方塔胎质较为粗糙,色泽白,泛淡黄。因此我们确认此件器物是永和窑南宋产品。

在古代重要建筑样式等级上,庑殿顶建筑等级最高,其次为歇山顶或攒尖顶。宋代塔平面六方、八方、十二方等平面多边形样式流行起来。门的形制也有规范,板门用作住宅外门、城门、宫殿祠庙的大门。最为牢固的板门采用特别做法,做成光平无缝,不起任何线脚,表面光平如镜面,故亦称镜面板门。等级高的王府、宫殿等板门在正面用门钉。钉头加溜金铜帽为装饰品。门环由兽首衔住,称铺首。一般住宅不用门钉。因此此座建筑的样式决非普通的民居,等级较高,我们认定其为塔。从绿黄釉四门方塔形制看,褐彩卷草纹六方塔上部也同样缺失上部。

三. 永和窑烧造瓷塔的历史

背景和地方因素

宋立国之初,太祖提倡佛教,加以保护,其后的历代皇帝继续扶持和利用,停止寺院废毁,迎送印度求法,翻译刻印经书,放宽度僧名额,大量发放度牒。宋太宗曾对宰相说:“浮图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忘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既释氏所谓利他也。”宋代佛教以百姓易于接受的禅宗和净土宗为主流,并在其教义引入孝道等中国传统观念,采用更加世俗化的拜佛、念经、祈祷和超度亡灵等神学迷信形式,因而得到了更多宋人特别是平民百姓的信仰,更加普及了。

禅宗主张修习禅定。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6年)从南印度乘木舟航海来到中国传播佛教,经慧可、弘忍传到神秀、慧能,分为南北二宗,慧能往下又分南岳、青原二大系。行思(?~740年),慧能门下上首弟子,俗姓刘,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秉承师命,回到江西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弘法,开青原一系。

青原山海拔320米,峰峦连绵10余公里,古木蓊郁,奇葩芬芳,碧泉翠峰,情趣高雅。行思于唐神龙元年到青原山创建寺院,广聚僧徒,传布佛法,为禅宗南宗七祖,形成青原法系,乃南宗两大法系之一,后又发展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家。

江西地区佛教大兴,宋代禅宗盛行,延续不衰。宋代江西僧侣信徒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兴修桥梁,地方志上记载有:抚州乐安县的安浦桥、南昌府的程公桥、进贤县的通济大石桥、奉新县和丰桥、信州贵溪县杨林溪浮桥等^⑬。

宋人表示敬奉佛祖,信奉之诚,积累功德,往往借机“写经造像,修建塔庙”,在江西地区表现尤甚。江州景德镇寺新戒坛,兴建于熙宁九、十年间,所需的全部资金由太子宾客陈巽提供。北宋中期省聪和尚重建的高安县圣寿寺,所需资金由当地富户吴智讷施予。北宋中期兴建的广昌县大觉寺,由生员刘万年妻毛氏捐资八百两建造。奉新县宝莲院由富户刘氏出钱兴建,史载他将“新安乡田地,岁收百余斛及山地之利,永舍充于长命灯钜”。“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⑭”。

江西宋代建塔之风亦很兴盛,至今遗存的宋塔不下十处,如北宋建隆二年建筑的浮梁县西塔寺塔^⑮,南宋的安远无为塔,北宋元丰五年的吉安市区的

澄江仕塔^⑦,天圣元年的赣州舍利塔^⑧等。明《东昌志》云:宋代“庐陵为桂刹者累百,为禅刹者十。”

宋代永和镇东濒赣江,隔江与青原山相望,宋代繁荣,街道纵横,商铺众多,佛教浓厚,寺塔林立,僧多徒众,香火鼎盛。据当地《萧氏族谱》记载的佛教寺庙或与佛教相关的古迹有:慧通庵、辅顺庙、监镇庙、本觉寺、佛母墓、宝寿寺、古佛寺、慧灯寺、知度寺。据《庐陵县志》卷十三《礼典志·寺观》记载,本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唐天复二年(902年)永和又建了一座慧灯寺。本觉寺塔位于永和镇的南端,本名飞来塔,因居本觉寺旁,故本觉寺塔,现仍然耸立在永和窑遗址旁。可见永和窑烧制瓷塔是佛教兴盛的风气和永和当地香火旺盛的结果。

四. 永和窑瓷塔的意义

据考古资料,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瓷塔是安徽省郎溪县郎川河沙层中出土一座锥形瓷塔,高21、底径17厘米,上有刻划款铭“中和四年(884年)九月”字样^⑨。五代瓷塔增高,浙江省泰顺县出土一座五代青釉单檐方塔,残高22、底径10厘米,塔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构成^⑩。宋代已经具备烧制大型瓷塔的工艺技术,北宋和辽瓷塔增多,河北密县法海寺塔塔基出土一座三彩密檐式塔,高98.5厘米,有咸平二年(999年)款^⑪。山东省香河县统和二(1006年)栖隐寺塔塔基地宫出土白瓷塔形罐,高58.5厘米,圆体,样式如罐^⑫。近似的白釉塔在1964年河北省武清塔基中还出土一件^⑬。1976年河北省灵寿麒麟幽居寺旁出土一座三彩双檐六方攒尖单层塔,高78.0厘米,刻划款铭大安三年(1210年)^⑭。本文所述三件永和窑瓷塔形体巨大,可以说是目前存世的永和窑瓷器中体量最大者,绿黄釉四门方塔的完整高度应高于100厘米,恐怕也是目前所见存世稀见的宋代大型瓷塔^⑮。瓷塔这样的大件瓷器,不仅要求工艺高超,而且造价昂贵,非属普通的日常用器,烧造的数量有限。从各地瓷塔的来源看,基本出于塔基地宫,或寺庙之中。永和窑的瓷塔功用和出处亦或如此。

宋代吉州佛风厚重,永和寺庙林立。永和利用当地瓷业昌盛条件烧造佛器满足僧侣信徒的需要,如香炉、香盒、净水碗和其它供养器物。烧造重器瓷塔尤能虔诚地表示敬佛、礼佛的心愿,瓷器长存不朽,优于金属制器,且新颖别致,不失为高档佛器。永和窑匠将自己聪明的才智,娴熟的工艺,虔诚地投入到佛教重器瓷塔的烧制中。永和窑瓷塔的工艺主要体

现在:

1. 仿木造型,塑制复杂。采取分段制作,组合成形,解决塔体超大制作困难和胎体难以承受的技术问题。分接部位选择屋面半腰处,有利于下部各面封闭,形成完整的围框,既增加了自身的强度,也提高承重量。塔体层位形异,构件多杂,要求精细,因而无法拉胚,全为塑制,边线粘接。制作工艺上柱圆梁正,门窗规整,勾阑细致,斗拱逼真,屋檐飘逸,瓦拢分明,表现出永和窑匠高超的雕塑技能。

2. 烧焙成熟,工艺先进。永和窑瓷土先天不足,胎质较粗泛黄,一般器物给人感觉火候不高,坯体烧结程度不够,较为疏松,因而曾有人议论永和窑瓷器坯体称瓷像陶。而永和窑瓷塔坯体烧结好,硬度大,强度高。绿黄釉四门方塔的釉色不仅晶莹纯正,且胎釉结合牢固,没有剥脱。永和窑瓷偶有一器之上绿黄二种釉色,已是十分稀少,四门方塔一器之上采用三种釉色更是罕见,非常珍贵。褐彩卷草纹六方塔的褐彩卷草纹装饰性强,是永和窑富有特色的纹样,最具代表性,褐彩之上再加以剔划细线做法只在精细器物上采用,起到了增色添辉作用。

瓷塔是吉州永和窑的一个重要品种,岁月的沧桑掩盖了人们的记忆,再现的瓷塔又透出其迷人的魅力。它集中体现了永和窑瓷器制作的优秀工艺,代表了永和窑烧造的最高水平,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宋朝的政治,佛教的文化,时代的风尚,江南的建筑,永和的窑业,乡土的民俗等都寓于其中。随着我们对永和窑瓷塔研究的深入,它们身上内含的历史会愈显厚重,文化魅力更加迷人。

注释:

①、④ 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第50页、图334,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

② 王吉允:《江西省吉安县发现吉州窑瓷器》,《考古》1991年第10期。

③、⑥、⑦、⑨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图93、95-1、第171、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⑤ 详见梁思成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图集·斗拱》第15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⑧、⑩ 傅熹年:《论几幅传为李思训画派金碧山水的绘制时代》,《文物》1983年第11期。

⑪ 程先通:《安徽黄山发现宋墓》,《考古》1997年第3期。

(下转第92页)

群中变异的作用。后者被认为是分辨特定人群和文化结构、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环境适应方式异同的最重要依据。

系统论代表了一种注重内在关联的理论传统,它强调研究者理解变异对了解一个群体结构和适应至关重要。而且,尽管像一些考古学家所言,从逻辑上说民族学家所研究的所有社会文化现象考古学家都能研究,但很显然,我们对于过去的有些方面可以讲很多,而另一些方面我们能讲的却很少。在这种意义上,系统论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对于考古学家是有用的,它要求尽可能详细关注考古学家所想提供的特定系统运转的细节。

过程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理论

最近弗兰纳利提出,过程考古学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法则和规律”派,注重人类行为和文化进程潜在法则的检验;二是“Serutan”派,注重把史前社会作为自我调节的系统来理解。我比较赞同弗兰纳利的看法,过程考古学可以分为这两种不同的学派。更简洁地说,一些过程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建立新概念来解释过去,而另一些过程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定义和检验关于过去假设的精确化和量化。两种关注都源自对考古学在解释和说明过去上的不满。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过程考古学家们以为自己只要采用了量化技术,就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做法,即使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与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使用了新概念,他们就是过

程考古学家,而毫不顾及这些概念运用中的精确性以及假设的检验。无论是精确化还是概念创新所带来的益处,本身都没有止境。人们应该设想,“法则和规律”与“Serutan”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区别,某天将会融合为考古学中必要的劳动分工,而非冲突的根源。

就潜在冲突而言,系统论文献和生态学文献都很重要。这两类文献有很多重合点,但对过程考古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共有一个关键特点:我们在两类文献中发现了考古学中争论和歧见的所有根源。现在有统计学和非统计学系统论学家、数学和非数学系统论学家、归纳法和演绎法系统论学家,以及沿大量其它合理方向分化的其他学派。马特森和伍兹(F.R. Matson & J.J. Woods)讨论过在系统论文献中很容易定义的对立的理论观点。对生态学文献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评论。

在这个意义上,从狭义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一般系统论和生态学导致考古学冲突的表面化,又使过程考古学家尽管内部存在重大分歧,对外却团结一致(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仅见于考古学,在关注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中,对生态学的歧见也毫不逊色)。在更基本和更宽泛的意义上,这些文献,准确地说正由于它们的多样性,促进了交流,并成为过程考古学家新概念和新的分析工具的重要来源。

(上接第117页)

⑫ 王宁:《吉州永和窑两块瓷片款铭的识读和意义》,《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3日第7版。

⑬ 陈伯泉:《吉州窑烧瓷历史初探》,《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增刊)。

⑭ 参见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⑮ 参见徐梁吉、方建新、方健、吕凤棠著:《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⑯ 李文采:《景德镇旧城红塔的创建年代》,《江西文物》1983年第4期。

⑰ 彭适凡、刘林:《吉安北宋江仕澄塔出土文物》,《江西文物》1982年第1期。

⑱ 陈旭:《赣州舍利塔》,《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

⑲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三联书店,1990年。

⑳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人民出版社,1988年。

㉑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㉒ 张兆祥编:《廊坊文物》第202页,开明出版社,2001年。

㉓、㉔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图493、588,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印书馆,1995年。

㉕ 据网上资料:福州市鼓山涌泉寺现存一对宋代千佛瓷塔,高6.38米。

(责任编辑:周广明)

吉州永和窑瓷塔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